

试论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问题 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宫玉松

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历史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了收入分配恶化问题,对这一现象加以探讨,从中得出符合实际的正确的认识,这对我国将不无借鉴意义。

一、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特征

1. “收入分配更不平等是不发达国家的特征。”^①事实确实如此。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阿鲁瓦里亚计算,在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占人口20%的高收入阶层拥有53%的国民收入,而占人口40%的低收入阶层仅得到12%的国民收入;西方国家占人口40%的低收入阶层得到国民收入的16%;社会主义国家占人口40%的收入最低的人得到国民收入的25%左右。美国海外开发委员会主席格兰特说:“按传统标准看,墨西哥是非常成功的,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过去15年每年上升6%或7%;但是,与此同时,墨西哥的失业却一直增加,而且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一直在明显扩大。50年代初,墨西哥人口中收入最高的1/5人口的总收入,等于收入最低的1/5人口的总收入的10倍。”^②在印度,占30%的下层印度人,1961年仅占全国财富的2.5%,1971年更降至2%;同期30%的上层印度人,占有的财富由79%上升到81.9%。可见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收入分配恶化问题,即收入分配越来越严重地向高收入阶层倾斜而不利于低收入阶层,从而显示出“库兹涅兹曲线”所描绘的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的典型特征。

2. 收入分配的高低悬殊突出表现在不同收入阶层生活水平、生活方式的差别上。上层分子的豪奢与广大低收入阶层的困窘形成鲜明对照,“它(印度)包含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先进技术的奢侈的剥削的富裕世界和贫困世界”。^③发展中国家高收入阶层的高消费倾向是很著名的,“从维希进口瓶装矿泉水,从波尔多进口酒,从萨维尔罗进口服装,从底特律进口汽车”。^④而本国的很多穷人连基本生活需要都得不到满足。

3. 收入分配恶化还表现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社会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现代化城市与中世纪乡村、小块飞地与边远内地,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资本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二元结构状况不断加深。特别是城乡差距最为严重。许多国家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农业比较利益低,农民收入微薄,穷人主要集中于农村。60年代初,加蓬非农业收入是农业收入的15倍,利比亚是9.5倍,泰国是6.3倍。亚非地区75—80%的贫穷人口居住在农村,拉美地区这一比例约为80%。

4. 当然,由于发展中国家内部构成的复杂性、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政策等各不相同,因而收入分配状况在不同国家是有差别的。少数国家如新加坡,斯里兰卡等国比较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并能采取有效措施,如通过有效的实施累进所得税政策,或者比较注意满足穷人生活需要,或者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从而改善了收入分配状况。例如巴基斯坦与斯里兰卡收入水平大致相同,但前者低于贫困线人口的比例却是后者的3倍以上。可见,收入分配状况在发展中国家内部是不平衡的。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其普遍特征。

二、分配不公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

收入分配具有保障、维护、稳定等多种功能。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则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差距过于悬殊,突破了合理的界限,造成了许多不利影响。

1. 降低储蓄和积累倾向, 并引起消费早熟, 从而不利于资本的形成。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资本短缺这一严重障碍, 因而增加储蓄和积累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收入分配的过分悬殊却不利于储蓄和积累。应当作为储蓄主体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低收入阶层由于贫穷而缺乏储蓄能力。智利在1960—1970年间的储蓄率为15.1%, 而在1974—1982年间降为11.5%, 其中1981年和1982年分别降为7.3%和2.6%。储蓄率降低的根本原因, 一是这些年中广大中下层群众的实际收入水平提高有限, 二是国内财富的日益集中和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⑤高收入阶层虽然掌握大量资金, 却由于他们普遍的高消费、低储蓄、低投资倾向而被浪费和流失, 从而严重削弱了发展中国家资金积累能力。

2. 减少市场容量, 降低有效需求。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主要依靠国内市场, 出口仅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6.8% (1980年)。因而能否保证以至提高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下层群众的购买力, 是能否具有一个牢固广阔的国内市场从而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提。但由于收入分配极不平等, 广大中下层群众的购买力很低, 与迅速增长的生产能力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 从而严重制约了生产的发展。“当(印度)3.2亿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被排斥在粮食、布匹、住房和其他基本生活品的市场之外, 现有的工业就最终要发生危机。”^⑥据统计, 拉美国家40%的人口由于购买力低下, 实际上被排斥在市场之外。作为市场主体的广大中下层人口反而对市场的贡献不大, 这也是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

3. 造成资源配置不合理和经济结构被扭曲。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造成了有效需求的双重性(大多数人对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和少数人对奢侈品的需要)和严重不平衡性(少数富人的需要压倒了多数穷人的需要), 从而使经济资源的配置集中于城市中为富人提供高档消费品的部门, 而为满足广大低收入阶层生活必需的部门特别是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经济结构被扭曲, 二元状况进一步加深。“在一个穷国里高度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意味着在首都盖起移植器官的诊疗所而不在农村建造饮水净化系统, 生产小轿车而不生产公共汽车, 修建乡村俱乐部而不盖学校, 建造可口可乐工厂而不建奶牛场等等”。^⑦这种畸形的资源配置状况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分配和经济不发达状况。

4. 经济发展得不到广大下层群众的参与和支持, 这是阻碍许多国家发展的关键性“瓶颈”。由于占人口大多数的下层群众在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极少, 他们在生产、教育、保健、社会服务等方面条件很差, 因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不高, 生产能力很低, 并缺乏必需的购买和储蓄能力, 对经济增长所能做出的贡献与他们所处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称。经济发展离开大多数人的参与、支持, 离开大多数人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购买力的提高, 事实证明这种发展至少是有严重问题的。

5. 冲击社会公平, 激化社会阶级矛盾。收入分配极不平等造成的广大下层群众的贫困、失业、缺少知识、高死亡率等现象直接损害了社会发展目标, 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 并成为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的重要根源。收入分配极不平等也会加剧政治上的不平等, 形成少数富人收买政客、操纵政治、政府机构贪腐低效的局面。贪污腐败问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已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

三、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

造成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是复杂的。除了社会制度因素之外, 还由于以下原因,

1. 经济发展方面的原因。在经济发展初期,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 资源配置相应发生了向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倾斜的变化。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具有比传统农业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 其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农业, 因而工农业比较利益差距拉大, 收入分配明显不利于乡村和农业及农民而偏向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和工人。相应地, 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动, 社会对资本、技术、管理才能等稀缺生产要素的需求急剧增长, 收入分配明显有利于少数高收入阶层、企业家、技术人员、熟练劳动力, 而不利于广大缺乏文化、缺乏技能的低收入阶层。收入分配的上述变化是经济发展初期的必然现象。

2. 社会经济结构方面的原因。上述由于经济发展而造成的不同地区、部门和个人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在一定时期内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但如果长期维持并不断加强这一格局, 就表明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失调, 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和拥有稀缺生产要素的少数人的发展并未带动农业部门和广大农民、城市贫民的发展。相反, 前者的发展是以损害后者为代价。两者差距日趋扩大, 矛盾不断加深, 国内经济形成典型的二元结构状况, 从而使收入分配差距突破了合理的界限而走向严重不平等。

3. 社会经济政策方面的原因。上述的社会经济结构失调与政府片面性的社会经济政策有很大关系。政府片面强调经济增长, 忽视收入分配的改善, 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不相协调。为了加快经济增长, 执行片面工业化政策, 致使农业部门和农民利益普遍被忽视。具体表现在: (1) 政府公共支出、社会服务、减免税收、低息贷款等政策优惠主要集中在城市和农村中的少数商业性大农场。政府的大力扶植有力地促进了它们的发展, 而广大农村和农民的利益则被牺牲了。例如墨西哥政府的政策“忽视了墨西哥全国的劳动密集型的小生产而首先鼓励的是大农场和建在城市的工厂。……此外, 政府提供的就业、住房、教育和保健设施, 一般都对高收入集团有利”。^⑧前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也指出: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首先着眼于经济增长的政策, 主要使人口中百分之四十的最上层得到好处, 公共服务和投资基金的分配也倾向于加强这种趋势而不是削弱这种趋势。”^⑨(2) 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作用微弱, 突出表现在税收政策上, 一方面对高收入阶层、现代部门、大垄断财团经常实行抵税、减税、免税政策; 另一方面对具有收入调节性质的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财产税征管不力, 偷税漏税盛行。因此高收入阶层并未负担相应的纳税义务, 纳税负担主要落在广大低收入阶层的头上。1980年以前印尼不同年度的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款的偷漏率达84—94%, 公司所得税的偷漏率则达76—93%。印度占城市地区人口20%的最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在纳税前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为57.6%, 纳税后仍占56.2%,^⑩可见政府调节收入分配是何等软弱无力。

4. 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性, 使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地残存着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及相应的社会政治权力结构, 社会生活中宗教、宗法、等级势力及等级观念严重存在, 政治生活中官僚特权阶层势力强大, 政府行为不规范, 贪污腐化盛行, 竞争机会极不均等, 政治经济领域中存在严重的垄断性, 市场机制的作用被官僚集权制所扭曲而变形, 所有这些都维护并加深收入分配的极不公平。美国经济学家格鲁奇分析印度政治的一段话在发展中国家很有代表性, 他说: “由军队官僚阶层、大企业团体和该国的王公与富农组成的印度权力结构的权势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受到触动。这些上层的达官贵人千方百计地拖延土地改革和偷税漏税, 并使政府的援助计划有利于高收入集团, 不利于低收入集团, 还设法阻挠对失业和就业不足问题的指责。执政的国大党不但没有起到改革的火车头作用, 反而受一些高收入经济利益集团的支配。”^⑪

四、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尽管社会制度根本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但相似的发展阶段和历史基础, 以及寻求经济现代化的共同任务, 使发展中国家在收入分配问题上的经验教训, 对我国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 追求经济“效率”不应以损害社会公平为代价, 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重视收入分配的改善。从发展中国的实践来看, 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并不利于经济的正常发展, 阻碍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广大低收入阶层由于被排斥在经济增长过程之外而对生产和市场所做的贡献太小。这即是说, 孤立地突出“效率”而完全忽视“公平”事实上并未能保证“效率”而只能陷于既无“效率”又不“公平”的恶性循环。

2. 同样的, “公平”也必须建立在“效率”的基础上, 经济增长是公平分配的物质前提。因为生产决定分配, 生产的方式和数量决定了分配方式和可供分配的数量。不公平固无效率, 而无效率也无公平可言。解决分配问题既不能就分配论分配, 更不能采取妨碍生产、损害效率的平均主义的做法, 而只能通过刺激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来为公平分配创造物质前提。一些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的措施所引起的分配上的问题, 只应从外部施加必要影响, 采取经济手段为主加以适当调节, 而不能影响生产的发展。

3. 因此,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并不一定是交替性的此长彼消相互对立的关系, 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是统一的, 互相促进的关系。经济发展应当而且可以兼顾效率与公平双重目标, 做到既保证经济富有效率又不损害社会公平, 从而使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以东南亚五国为例, 新加坡通过有效地实施累进所得税法, 不断增加职工收入, 既改善了收入分配状况, 又取得了最高的经济增长率; 而其他四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没有明显的改善, 特别是菲律宾和印尼的贫困问题非常严重, 经济增长率也远远低于新加坡。可

见在促进效率的前提下兼顾公平，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重视改善收入分配问题，不仅并行不悖，而且可以取得最佳效果的社会经济发展。

要协调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应从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应打破形形色色的垄断、创造平等竞争条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生产、经营、投资、储蓄的积极性，以提高经济效率、增强经济活动；另一方面，政府要对由此引起的收入分配的过大差距加以适当调节，采取诸如累进所得税、对奢侈品课征重税，对生活困难者进行补贴，尤其是要设法提高广大低收入阶层的劳动生产率、收入水平、就业机会等措施。这不仅有利于减轻贫困，促进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社会稳定。在我国现阶段“在生产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体现社会公平，使人民群众普遍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是一项重要的分配原则。”而这是单纯的市场机制所难以做到的，而必须依靠政府宏观调控作用。

4.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必须进行相应的社会政治变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不仅受经济因素影响，而且受社会、政治、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的强烈影响。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非经济因素可能比经济因素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等级制度、特权阶层、政治体制、价值观念，以及在经济转轨、社会经济迅速变化时期的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大规模流动、社会经济生活的复杂化都很容易发生的以权谋私、权力商品化的腐败现象，都是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只寄希望于经济的单项改革而不进行综合的、全面的改革，必然会影响经济发展，并加剧收入分配不合理状况，激化社会矛盾。许多经济学家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如缪尔达尔认为社会平等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为了实现社会平等，他主张进行包括改革土地所有制、权力关系、行政管理、教育等方面的社会改革。格鲁奇认为“国家计划不应仅限制在狭小的经济范围内，而应考虑经济范围以外的许多可能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社会要素”。^⑩因此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健全民主法制制度，才能规范政府行为，戒绝贪腐，提高效率；进行社会文化体制改革，才能优化社会结构，破除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不合理的现象。

6. 必须重视农村地区、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农业在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高度评价了农业在解决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基础，因为它能够同时促进公共消费，储蓄和税收的增加。”^⑪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低收入阶层大多居住在农村，农业发展缓慢，农村贫困落后，这是其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也是其政局不稳、社会动荡最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只有重视农村进步和农业发展，减少农民贫困，增加就业机会和教育、卫生、交通等社会服务，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才能缓解和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保持社会进步和社会稳定，并为工业化奠定最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 格里多里等著：《比较经济制度学》，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第398页。

②④⑦⑧⑨ 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4—20、173、166、20、12页。

③ 引自巫宁耕著：《战后发展中国家（分论）》，第107页。

⑤ 苏振兴等编：《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29页。

⑥ 引自《世界经济》，1982年第3期，第18页。

⑩⑪⑫ 格鲁奇：《比较经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842、848、850页。

⑬ 刘易斯：《发展计划》，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第88页。

（责任编辑 徐云鹏）